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主编 • 吴富恒
编委 吴富恒
王誉念
刘念兹
王治奎

3

山东教育出版社

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三卷

吴富恒 主编

上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下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29.5 印张 507 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7—5328—0842—4/G·704

定价 10.65 元

目 录

屠格涅夫	吴典训(1)
波德莱尔	刘自强(21)
陀思妥耶夫斯基	宋寅展(42)
涅克拉索夫	余一中(67)
福楼拜	杨 剑(86)
裴多菲	兴万生(120)
小仲马	汪文漪(137)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余一中(157)
易卜生	王忠祥(174)
车尔尼雪夫斯基	翁义钦(194)
托尔斯泰	余绍裔(214)
迪金森	王 闻(247)
莫里斯	黄嘉德(267)
马克·吐温	董衡巽(284)
豪威尔斯	付 攻(309)
左拉	许光华(327)

哈代	杨岂琛(345)
詹姆斯	王誉公(361)
法郎士	熊玉鹏(387)
显克维奇	陈冠商(403)
斯特林堡	何孔鲁(423)
莫泊桑	李志清(440)
马蒂	王央乐(465)
契诃夫	聂刚正(482)
泰戈尔	张光璘(510)
黎萨尔	凌 彰(529)
华顿	徐守昌(545)
森鸥外	高文汉(564)
库尼亞	王央乐(577)
夏目漱石	刘宏多(593)
里柯克	蓝仁哲(613)
诺里斯	常耀信(626)
克莱恩	孙筱珍(643)
德莱塞	莫自佳(657)
岛崎藤村	陈德文(676)
德钦哥都迈	马尚忠(692)
伦敦	梅 子(708)
伊克巴尔	李宗华(728)

屠格涅夫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генев)

(1818—1883)

吴典训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是 19 世纪俄罗斯杰出作家。1818 年 11 月 9 日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是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上校。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从她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大批财产，是个拥有五千奴隶的农奴主。她对农奴婢仆横暴专肆，酷刑体罚以至流放。在此环境中生长的屠格涅夫，心中早已唤起对失去自由的农奴的同情，开始产生对农奴制的憎恶。他痛恨奴隶主，感到农奴制不合理，后来誓言决不同农奴制这一仇敌妥协，而要与之斗争终身。

1827 年屠格涅夫随全家迁到莫斯科，旋即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1833 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他在这里参加过赫尔岑、斯坦凯维奇等人组织的革命小组，讨论俄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一年后，即 1834 年他又随家迁居彼得堡，转

入彼得堡大学哲学语文系。是年他开始了他的早期文学活动，创作了诗歌《傍晚》、《致威涅拉·美吉采依斯卡娅》、《秋》、《花》、长诗《斯节诺》等。其父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在这一年病逝。

屠格涅夫于1837年大学毕业，1838年至1841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研修哲学、历史和古典语言，并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期间，他结交了当时旅居德国的俄国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等人。1841年《现代人》杂志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即诗歌《傍晚》、《献给梅迪其之维纳斯》。5月返回俄国，在他的故居斯帕斯克村逗留期间，曾与他母亲身边的一个女奴发生关系，后来这个女奴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彼拉盖雅。九年后他将女儿送往巴黎，交给他的密友维亚尔杜抚养。其后由于他母亲的要求而到内务部“特别办公厅”供职两年。1843年，当屠格涅夫25岁时，他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是当时俄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人物，文学界几乎到处都看到他的影响。屠格涅夫也受到他不少熏陶，这对屠格涅夫一生的文学生涯起了极具重要的作用。

屠格涅夫成年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法国时间最长。他与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福楼拜、都德、埃·龚古尔以及莫泊桑交往甚密，并将俄国文学传播到欧美。但他所以特别留恋法国，也同他的恋人、法国歌女波利娜·维亚尔多有关。1843年冬天，维亚尔多随歌舞团来彼得堡演出意大利歌剧，屠格涅夫一见倾心。但维亚尔多已是有人之妇，因此屠格涅夫与其保持纯洁的友谊关系，并成为她全家的友人，而独身一生。作家后来写就的许多充满诗意的爱情作品都与作家这一经历有关。

从 1863 年起，屠格涅夫同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德国巴登—巴登。1871 年普法战争后，又随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至谢世。维亚尔多在屠格涅夫创作中留下了不少的痕迹。

1843 年屠格涅夫创作了第一部剧作《不谨慎》和长诗《巴拉莎》。他把《巴拉莎》的出版当作自己文学生涯的正式开始。别林斯基对这部作品大为赞赏，说《巴拉莎》应该算是 1843 年俄罗斯诗歌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更加接近莱蒙托夫所开创的那个新的诗歌流派。1844 年创作长诗《神甫》。1845 年创作长诗《交谈》。1846 年创作剧本《缺钱》、长诗《安德烈》、《地主》、中篇小说《安德烈·格洛索夫》和《三肖像》。

屠格涅夫早期文学活动的特征基本是模仿 19 世纪上半期古典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的创作。其中的浪漫主义之作，特别模仿了拜伦和莱蒙托夫的诗作。这时他似乎尚缺乏自己的风格，可以说是未来作家的探索阶段。

二

1847 年屠格涅夫陪伴别林斯基去普鲁士的萨尔斯堡治病。在与别林斯基相处的日子里，在别林斯基直接影响下写了《猎人笔记》中的几篇特写：《总管》、《事务所》、《两地主》等。是年，《现代人》第一期刊载了他的《猎人笔记》中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这篇随笔是用作者自己名字的缩写署名的，编辑把它安排在杂录栏里。但这短篇却意想不到地引起读者注意，以至轰动了整个文坛。别林斯基认为这篇随笔获得成就的原因是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

民”，高度称赞作家在抨击农奴制方面另辟了新径。屠格涅夫没有想到《霍尔和卡里内奇》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从而受到极大的激励。过去他怀疑自己的才能而欲放弃文学事业，现在重新振作了起来。从1847年至1851年《现代人》陆续刊出他21篇随笔。1852年8月《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后几经修改，于1880年出版了这部包括25篇随笔的集子的最后定本。

《猎人日记》是屠格涅夫成名之作，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巨著之一。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地主对农民那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和农民的人格尊严横遭践踏。在这以前一些先觉的作家所自负的使命是将农民从涂炭中解放出来，但他们认为农民愚昧无知，缺乏崇高人性，处于畜牲一般的状态，只是怜悯的对象，从来没有想到农奴应该是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而屠格涅夫在这方面开创了新的道路，他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民主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从农奴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画面，真实地再现了农奴倍受欺凌的真象，肯定了他们的才能睿智、勤劳勇敢、崇高而纯洁的内心世界，同时无情地鞭笞了地主阶级的残暴、伪善、奢侈、淫荡和冷酷，不仅从个人生活方面，而且也从社会生活方面将农奴主的丑恶暴露无遗。屠格涅夫不愧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以他独特的抒情笔触，将俄罗斯大自然的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并以此衬托出广大农奴备受虐待而陷于非人生活的悲惨景象。他的作品对社会的不公平没有那种锋芒毕露的批判，但他却以洗炼的艺术家的直觉，含蓄的手法给人以启示，反而更增加了他作品的感染力。《猎人笔记》开始体现出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标志着他从浪漫主义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在创作《猎人笔记》的同时，屠格涅夫还写了一系列的小说和剧本。其中有中篇小说《好决斗的人》和具有“自然派”特色的中篇小说《彼得施科夫》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剧本创作也显示了屠格涅夫的艺术功力。他写的反映贵族生活和习俗的《缺钱》(1846)、《贵族长的早餐》，反映“小人物”生活的《单身汉》和《外省妇人》以及具有不同社会心理的典型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物从细处断》，都受到好评。而创作于1850年的《村居一月》应当是屠格涅夫最为有名的剧本，它开始展现出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的冲突。那时俄国解放运动正在从贵族革命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阶段，作者抓住这一新的重大社会现象，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颓废腐朽的贵族阶级之外找到了新的正面人物。同年写的《多余人的日记》，勾画了“多余 人”的形象，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 人”的系列形象最早得名于这部作品。

1850年母亲断绝了给予屠格涅夫的经济接济，他不得已回国。接着母亲去世，他便在自己的庄园中进行解放农奴的改革。1852年果戈理去世了，沙皇政府下令不准悼念这位伟大作家。屠格涅夫非常不满，便违令写了悼文，发表在《莫斯科新闻》杂志上。沙皇政府惩罚作家，下令拘留他一个月，而后遣返原籍，在警察监视下，在斯巴斯克叶村居住一年半。他的著名的中篇小说《木木》便是他在彼得堡被拘的一个月中写成的。小说写的是真实的故事。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根据作者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塑造的，聋哑农奴盖拉新的原型本是母亲的看门人。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女地主的残暴与冷酷，和农奴盖拉新真挚的感情和善良的心。小说对农奴制的血泪的

控诉，引起了人们对农奴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在监禁期间，他还写了中篇小说《旅店》、《三次相逢》等。在《三次相逢》中，作者以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象诗一般地勾画出俄罗斯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一对男女的爱情，并以别具一格的手法又一次塑造了“多余”人的形象。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写道，读了《三次相逢》之后，他哭了，因为它“每页都有病态而又甜美的忧伤触动着心灵”。这一中篇的主题后来作者在《春潮》和《烟》中又作了进一步发挥。

1853年监禁期满，屠格涅夫返回彼得堡。1854年创作了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和《两个朋友》。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仍然看到几种社会典型人物在道德与心理方面的冲突。1855年创作中篇《雅科夫·巴辛科夫》。雅科夫·巴辛科夫生来就是个痴爱幻想和空想，否定从实际观点来看人生的绅士。杜勃罗留波夫在谈到这篇作品时认为，雅科夫·巴辛科夫基本上和罗亭、拉夫列茨基一样，同属于“多余”人的类型。1856年写的中篇小说《浮士德》，其主题也属于这个范畴。同年《现代人》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

《罗亭》是作者于1855年6月在他的故乡斯巴斯科叶村开始写作的，同年7月完成。罗亭出身于小贵族家庭，聪明，热情，高尚而有才华，热爱真理，满怀理想，并能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的使命、民族的未来，唤起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愿望。但他本身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由于他的弱点，他不能够将理论付诸实践，缺乏实战能力，尤其是在他与娜塔莎的爱情中，更显出他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他虽然满腹经纶，但终因不能投入社会实际斗争中去，最后只能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多余”人。罗亭代表的是40年代贵族出身的

先进知识分子。50年代中期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让位于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时期，对这些过时的“优秀人物”作出结论已成为历史的要求。作者企图将俄国知识分子的迅速变化，加以概括，以典型化的手法表现出来。屠格涅夫的结论是中肯的，他谴责了罗亭的弱点，也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窄狭的，他们距离人民非常之远。但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屠格涅夫的结论几乎是与此相同的。

屠格涅夫写这部作品时煞费苦心。他说，他写作品从来也没有象这一部这么劳心苦思过。主人公罗亭原以青年时代的巴枯宁为原型，作者以赞赏和恼怒两种矛盾心情来处理这一人物，几易其稿，修改得渐渐脱离了原型，使罗亭形象要比巴枯宁广阔得多。但这部长篇刚一问世即受了种种非难，有些批评家认为作者虽赋予罗亭以伟大的社会使命，但他不能代表40年代的知识分子；罗亭缺乏复杂而又多方面的现实斗争，没有展示强有力的政治信念及伴随这信念的特性，只不过以恋爱为中轴罢了。不管怎样说，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思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积极作用。就写作技巧来说，作者别具匠心，独树一帜，毕竟还是屠格涅夫的一部杰作。

185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阿霞》是屠格涅夫对贵族知识分子性格较之以前更加彻底的剖析。他把主人公幸福不能实现的原因解释为“多余人”的软弱无能。阿霞是一个贵族与女佣的私生女，父亲死后一直受到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加京的抚爱。阿霞在爱情力量的冲击下，虽然意识到这种感情与自己对加京的忠贞相矛盾，但她终于真挚而无畏地向他作了爱情表白。在阿霞

向他倾诉衷肠的关键时刻，加京却惶惑、畏惧而退却了，暴露出他的自私、虚伪和怯懦。屠格涅夫带着热爱和同情来写小说女主人公阿霞，他说：“我写阿霞时非常激动，我差不多是含着眼泪写的。”《现代人》杂志主笔对这部作品倍加赞扬，给阿霞以极高的评价。我们在这部作品里不难找到屠格涅夫的许多个人感受。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作于1859年，是作家唯一得到批评家一致赞美的一部长篇小说。屠格涅夫艺术才能的成熟在这部杰作中全面无遗地表现出来。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拉夫列茨基的俄国贵族娶了一个名叫华尔华拉的妖媚风骚女子，他把她带到了巴黎。她到了巴黎却成了一个法国人的情妇。拉夫列茨基发现其妻的放荡堕落，愤然回国。不久得知华尔华拉猝死的消息，遂与贵族小姐丽莎产生了爱情。当他振作精神，决心重建家庭的时候，华尔华拉却突然归来。原来妻子亡故的消息竟是误传。在这种情势下，丽莎万念俱灰，悲痛之余，毅然拒绝了情人恳切的爱恋，将炽热的情火葬在遥远的修道院里。拉夫列茨基曾来到她那隐身的修道院，但她却为了道德的纯洁，把他视若“路人”：“她曾经紧挨他的身边走过；她以平匀的、急促而又柔和的修道女的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一眼也不曾望他”。这一全然现实化了的理想女性不禁令当时的读者大为感慨而油然起敬。

这部长篇描写的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在前进道路上所遭遇的困境和所经历的考验。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同罗亭一样，也是个“多余人”的典型。但是不同于罗亭的是，他比较务实，寻找投入生活的途径，尽力克服言行脱节和远离人民的倾向。

作为“多余人”的悲剧，他不象罗亭那样在理论与现实脱节中碌碌无为，而是在道德原则与个人幸福的冲突中屈从了上流社会的道德规范。他在妻子突然到来时面临着两种选择：同丽莎的幸福和对妻子与孩子的道德义务，但这位认为个人幸福是人生最高利益的男主人公最终还是选择了义务。拉夫列茨基向青年一代祝福，因为他为着新的人们和他们的信仰而“牺牲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这也正是说明他无法挽救贵族阶级没落的历史命运。屠格涅夫通过这部长篇似乎在客观上给贵族阶级唱了一首挽歌。

1860 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初恋》是一部根据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自传性小说。16 岁的符拉季米尔·彼德罗维奇就是年轻时的屠格涅夫。作者以其特有的抒情笔调写出了初恋的情怀，他说，《初恋》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每当读它时，其中的人物形象便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三

19 世纪 60 年代是俄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俄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着非常深刻的变化。1853 年俄土战争爆发，沙皇为了转移国内人民斗争视线和推行扩张政策，同土耳其发生了争夺克里米亚半岛和南高加索的战争。经过两年半的激战，于 1856 年俄国宣告失败，这不仅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腐朽，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农民暴动此伏彼起，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沙皇政府被迫在 1861 年 2 月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宣布

解放农奴，废除农奴制。但由于是自上而下地废除，因此实际上只能是一场骗局，正如列宁后来正确指出的，这是“臭名昭著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所以“改革”后农民反抗运动反而更为高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围绕着是拥护“改革”还是鼓吹农民革命这一根本问题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屠格涅夫作为艺术家，虽然表现出他进步的一面和天才的艺术直觉，继续批判旧制度，但也逐渐暴露出他的改良主义局限。这突出表现在《前夜》的创作和由此而引起的同《现代人》的决裂上。

屠格涅夫自1847年便不断为作为民主主义阵地的《现代人》杂志撰稿，1860年，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夕，他以其独特的艺术敏感性写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他在这部作品里将民众对自由之期望和大众的觉醒成功地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时屠格涅夫已将目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

屠格涅夫对《前夜》的构思很早就已开始了。俄国国内农奴制崩溃的前夜，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屠格涅夫预感到新的变革即将来临。以前的贵族革命的英雄不能肩负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寻找“新人”来代替贵族知识分子。

屠格涅夫在《前夜》中终于找到了他所企望的主人公形象。他以平民知识分子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和俄国姑娘叶琳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俩基于共同理想、伟大的社会事业和真挚的友谊而无私相爱。英沙罗夫出身于下层，他的祖国被土耳其人占领，父母被土耳其人杀害，他誓死复仇，将整个身心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他意志坚定，言行一致，头脑清醒，沉着而寡言，不同于贵族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叶琳娜聪明机智，在

各种阻碍面前有着不屈服和巨大行动的渴望，敢于鄙视世俗。她以火一般的激情争取自由和解放。她看到了生活广阔的前景，能坚定不移地奋勇前进。在最紧急而危险的关头，她远离家乡和父母，同英沙罗夫一起回到他的祖国保加利亚参加解放战争。英沙罗夫在回国途中病死，但她矢志不移，坚持去保加利亚完成丈夫未竟事业。在客观描写上，叶琳娜，特别是英沙罗夫真实地体现了当时俄国民主阶层的战斗精神，具备了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特征，是时代的“新人”，“新生活的先驱”。但由于作者改良主义局限，他一方面把英沙罗夫写成是保加利亚人，认为“在当时俄国人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人”；另一方面又把英沙罗夫仅仅写成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雄，而非反对专制农奴制的斗士。这就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战斗性。

这部作品一发表，立刻引起思想界褒贬毁誉的斗争。问题的焦点当然仍在革命还是改良上。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的著名论文中对小说作了深刻评价，认为主人公身上正确地体现了俄国“现代生活的良好倾向”，指出俄国革命需要自己的英沙罗夫；同时又批评小说没有看到现在距离俄国革命“只不过一夜”，认为作者对俄国现实的了解还不够正确。这种革命性的结论使屠格涅夫大为惊恐。他反对《现代人》发表这篇评论，而主持编辑部工作的涅克拉索夫还是发表了，结果导致了屠格涅夫及列·托尔斯泰等温和派退出了《现代人》。他们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终于决裂了。这是不奇怪的。屠格涅夫出于人道主人和自由主义反对农奴制并同情农奴的苦难，他拥护自上而下的改良，却不赞成革命。后来，他甚至站在改良主义立场，认为沙皇政府对农奴制的改革为英明

之举，曾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退出《现代人》后，他也并未靠拢反动势力，仍然对农奴制采取批判态度，仍然是一位进步的人道主义作家。

此后，屠格涅夫便倾全力写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于1862年交《俄罗斯导报》发表。这是一部属于社会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屠格涅夫给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首先冠以“虚无主义”的称号，这一称号顿时响彻整个俄国，并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得以应用。代表子辈的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要比《罗亭》中“多余”形象复杂和矛盾得多。他讲求实际，专心科学实验，为人正直、诚实、坚强而自信。他否定艺术、诗歌和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和准则，即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但有时他似乎又在蔑视人民，对他们抱有讥笑的态度。他一方面感觉到他同人民有血肉关系，但他们之间并不是亲密无间而是疏远的。屠格涅夫虽然肯定巴扎罗夫的力量和意义，但他并不是以完全同情的态度来写这个人物的。在巴扎罗夫与奥津左娃的交往陷入危境时，作者给他涂上了一层怀疑主义和悲观情绪的色彩，把他原来的信仰变成他所否定的浪漫主义俘虏。在屠格涅夫的笔下，他不是理想化的完人，他在社会活动中没有明确的理想，缺乏目的，并且嘲笑那些为改革社会而努力的人们。屠格涅夫在写这人物时心情矛盾，甚至有时对他流露出反感。

《父与子》暴露了“父”辈俄国自由主义贵族在社会革命形势高涨条件下表现的软弱无能和他们无益的社会活动。在客观的描写中，“子”辈巴扎罗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方面毕竟胜过了“父”辈代表贵族的保守派。屠格涅夫通过巴威尔这一形象，反

映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某些典型特征。他们已失去了自由主义的幻想而完全转到保守立场上去了。

这一长篇的问世引起了当时文坛上全然对立的两派阵营的攻击。保守派认为屠格涅夫崇拜虚无主义，否定和愚弄旧的传统世界，因此对他非常愤慨。进步派则认为巴扎罗夫不仅不能代表新时代，而且是对新时代的讽刺和歪曲。《现代人》则认为《父与子》是对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诽谤。只有赫尔岑和皮萨烈夫对巴扎罗夫作了肯定的评价，说巴扎罗夫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代表。

《父与子》中的“父”与“子”的阶级界线虽没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但作者却对“父辈”给予了较多的否定。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力量及其思想与艺术的统一给人以深刻的感染。虽瑕瑜互见，但它仍然被历史证明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屠格涅夫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它同《前夜》一起构成了屠格涅夫创作最光辉的阶段。

四

此后，屠格涅夫的思想和创作更加向右转了。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

1862年，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在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联系。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虽拖延了一年多，但在这期间他曾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1863年波兰爆发反抗俄国殖民统治的大起义，屠格涅夫又上书亚历山大二世，并捐献两枚金币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国士兵。同时，他又公